

兩京驛道至梁宋齊魯的路線意義 ——以盛唐詩人詩作為例*

郭俐君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生

提 要

唐代兩京驛道交通網路發達，行旅之沉熟絡，是一條著名的唐詩之路。兩京向東延伸至梁（今河南開封）、宋（今河南商丘），這條東西軸線，使得梁宋之地成為最大的陪都，位於重要的交通樞紐上。梁宋向東北延伸，便是齊（今山東淄博）、魯（今山東曲阜）地區，憑藉著梁宋的交通優勢，通往齊魯的交通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兩京至梁宋齊魯此條路線，因地緣關係與交通網路完善，成為盛唐詩人往返來去的選擇。盛唐詩人以停歇客寓、暫緩入彀、營求生計不同的仕進模式活絡於此要道，將其作為由仕「入」隱，由隱「出」仕之處。伴隨著詩人的遷移，兩京至梁宋齊魯的這條路線，是盛唐詩人的仕進之路，兩京與梁宋齊魯間不僅具有現實政治的地理空間意義，更多的是抽象心靈的空間意義。

關鍵詞：兩京 梁宋 齊魯 盛唐 唐詩

* 衷心感謝兩位匿名評審提供的寶貴意見，使本文更臻完善，謹致謝忱。本文在碩士論文研究成果上開展新議題，特別感謝指導教授陳珪的多次提醒和費心指導，使本文能順利接受審查和獲得刊登，深表謝意。

兩京驛道至梁宋齊魯的路線意義

——以盛唐詩人詩作為例

郭俐君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生

一、前言

隋唐五代時期，交通發展繁榮，水陸網路發達，社會秩序安定，經濟活動持續穩定成長，種種大環境下的條件允許，促成唐代詩人行旅活動的頻繁。詩人的遷移和旅遊，牽動著人文與地理的密切關係，更呈現出人文與地方的文化建構，以及詩人與空間的意義表現。李德輝曾提出真正的唐詩之路：「唐代兩京驛道」，文中也特指出唐代詩人兩京行旅的盛況，京畿之地交通網路的發達。^①筆者曾關注至「梁宋齊魯」的詩人，多在「兩京」與「梁宋齊魯」往返來去。^②這些詩人為何選擇到「梁宋齊魯」之地？在「兩京」與「梁宋齊魯」間遊走，有何特殊意義？唐代有所謂的「終南捷徑」之說，因終南山的地理位置鄰近長安，故成為有志求官卻不得志的士人，視此地為仕官的進退之地。^③因為地理位置的因素，故即便是

-
- ① 李德輝：〈唐代兩京驛道——真正的「唐詩之路」〉，《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0卷（2007年1月），頁23-27。
- ② 拙著：《唐詩中的梁宋齊魯——以外來詩人為主軸的地域書寫》，（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6月）。拙著中主要探討曾至梁宋齊魯之地的詩人，本文與其不同之處為此研究範圍僅限於盛唐時期詩人，以及齊魯並非泛指整個山東地域，僅討論今淄博與曲阜二地。
- ③ 關於「終南捷徑」之說，王靜於〈終南山與唐代長安社會〉言：「此處所謂的『捷徑』為仕途的捷徑，……但這也包含有客觀上的空間距離意義，即指終南為進入帝京的捷徑。」《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52。

聲稱隱居於此，還是可以在短時間內，得知京師的動態，決定自己的仕宦時機。

這些詩人亦是仿「終南捷徑」之法選擇「梁宋齊魯」？抑或是此條路線之於詩人有不同的意義？詩人在選擇可能的移動路徑時，對於地域的認同感相當重要，因為人類常藉由這種歸屬感，來界定自我、尋找自我，^④這也是筆者欲尋找這些詩人在「兩京」與「梁宋齊魯」追求的生命意義，以及此路線賦予他們的從屬意義。

據筆者目前所計，在盛唐時期，曾在兩京與梁宋齊魯之地往返的詩人有李邕、祖咏、李白、王維、高適、張謂、杜甫、岑參、蕭穎士、賈至、獨孤及、盧象、劉長卿。^⑤其中筆者以年譜、詩作都較趨齊全的李白、高適等共五位詩人為主要的研究對象，^⑥以其詩作作為研究底本，考察這些詩人為何會活絡於兩京至梁宋齊魯間，這條路線之於詩人的意義為何？

二、唐詩之路的延伸：從「兩京驛道」至「梁宋齊魯」

李德輝提出的「兩京驛道」是以長安、洛陽兩京驛道為樞紐，以汴州（今開封）、鳳翔（古岐州）為該道的東西之兩端，自此軸心向四方輻射，構成一個巨大的交通網路。^⑦其亦於他篇文章提及五都文學圈的功能地域概念，其空間佈局和結構「點——圈——線」的特徵十分突出，主張的「點」指的是圈內的中心城市，「線」指連接城市的道路，「圈」則有兩種，一則為圈內之圈，一則為邊緣區。以長安、洛陽兩京為中心的核心區（此為圈內之圈），從它的外緣到中原的邊緣，

④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頁136。

⑤ 本文盛唐分界是以開元元年（713）至大曆元年（766）為界，其詩人蹤跡以傅璇琮等著：《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瀋陽：遼海出版社，1998年）此為本，另以諸家年譜、生平事迹、詩作等相關研究成果為輔。其各家參考文獻，將在行文中分別羅列。

⑥ 其中王維因是被貶至濟州司倉參軍任（今山東濟寧），赴濟州途中曾經汴州（汴水），時帶有官職。又李邕、祖咏、張謂、蕭穎士、賈至、獨孤及、盧象因未有完善的年譜，其相關詩作亦甚少，較難看出其行旅路線與時間，故此八位詩人不在本文的研究對象內。

⑦ 同註1。

以成都、江陵（湖北荊州）、涼州、太原四個陪都為四角（此為邊緣區），邊緣區外是影響區（指的是周邊少數民族）。^⑧在李德輝提及的唐詩之路，齊魯並不是他首要關注的地區，但筆者認為根據唐代詩人行旅的路線選擇，是不應該忽略齊魯之地。

兩京至梁宋齊魯此條路徑，從長安、洛陽延伸至梁（今河南開封）、宋（今河南商丘）此條路，約在同一條東西軸線上，西東兩都之驛道東延至汴州，稱為大路驛，為唐代全國交通網之總樞紐。^⑨又唐代洛陽東行經鄭州至汴州大路驛四百二十里，急行一日一夜可達。^⑩由此可知，兩京至梁宋之地，在唐代往來甚為便利。而梁宋向東北延伸，便是齊（今山東淄博）、魯（今山東曲阜）地區。李德輝曾提出唐代以京城長安為圓心，以一千公里長度為半徑劃一個大圓圈，梁宋是在此圓圈之內，以直線距離而言，長安正東到洛陽 835 里，到汴州 1280 里。^⑪據《兩唐書地理志匯釋》載，齊魯在京師東北二千六十九里，在東都東北一千二百四十四里。^⑫雖齊魯並未在李德輝所提出的五都文學圈之內，但唐代徐州西北至兗州三百四十里，又一百九十里至鄆州，又一百二十里至濟州。^⑬其又另言，汴州與河南道東部有驛路相通。^⑭宋州作為一方的都會，是由於瀕著汴渠，其他方面的交通，特別是通往兗州、曹諸州的道路，也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⑮據嚴耕望所言海岱地區南北交通兩道，此東西兩條重要的南北交通線，已經可以說是山東地域極為方便的交通網路。^⑯雖然山東地區的陸路與他地相較之下，因為地形複雜，山勢

⑧ 李德輝：〈唐代五都文學圖略論——以都市、交通和物質文化為中心〉，「唐代文史的新視野：以物質文化為主——紀念杜希德國際研討會」論文（2010 年 12 月 21-23 日），頁 1-23。

⑨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1793。

⑩ 同前註，頁 1795。

⑪ 同註 8，頁 3。

⑫ 吳松弟編著，譚其驤主編：《兩唐書地理志匯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121。

⑬ 同註 9，頁 2120。

⑭ 李德輝：《唐代交通與文學》（湖南：長沙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4。

⑮ 史念海：《唐代歷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21。

⑯ 同註 9，頁 2109。

起伏的關係，較為不發達。但山東其實具有豐沛的水澤，也成為極為重要的交通幹線。例如黃河入濟水，自濟水入淮河，自淮河達長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¹⁷黃河與濟水，可以說是山東重要的交通隘道。山東西線之西道，既居黃河以南大平原之東緣，為南北交通走廊，又有水路之相輔，宜其在南北交通史上居於重要幹線之地位。¹⁸

梁宋位於天下之中心，兩州均處要道之處，又有汴河路通過，¹⁹汴州為自運河至長安所必經之路，汴都具四方貨賄匯集之盛，水路交通之盛，四夷之民、異域奇珍匯萃之盛。²⁰白居易〈授韓宏許國公實封制〉曰：「梁、宋之交，水陸合會。」²¹劉寬夫〈汴州糾曹廳壁記〉言：「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運漕。」²²從兩京至梁宋，不論是水路或陸路都因交通網路的完善，帶起商業興起、都市繁榮的盛況，正如杜甫所言：「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²³（〈遣懷〉）齊魯之地具先天的有利條件以及重視後天的建設開發，故桑蠶業、手工業、畜牧業、農業、礦冶業等都有一定程度的規模發展，經濟發展繁榮。中唐以前，中國的經濟重心在北方黃河流域，山東的淄博一帶最為富庶。²⁴李白〈任城縣廳壁記〉云：

魯境七百里，郡有十一縣，任城其衝要，東盤琅琊，西控鉅野，北走厥國，

¹⁷ 同註9，頁1998。

¹⁸ 同註9，頁2136。

¹⁹ 運河除了在南北物資交流上起了重大的作用之外，在輸送旅客方面的作用也不能忽視。唐前期和德宗興元後，運河暢通，南來北往的人們大致經由汴河路。翁俊雄：《唐代人口與區域經濟》（臺北：新文豐書局，1995年），頁554-556。

²⁰ 白壽彝：《中國交通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頁138-139。

²¹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注：《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3132。

²²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冊8，卷740，頁7649。

²³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頁1447。文中杜甫詩皆出此書，為避繁瑣，不再一一註記。

²⁴ 曾大興：《中國歷代文學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484。

南馳互鄉。……況其城池爽塏，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塊圠，有如此焉。萬商往來，四海絲歷，實泉貨之橐籥，為英髦之咽喉。²⁵（節）

齊魯位居重要的地理位置，地控四方交通樞紐，依山傍海的美景，城市風貌壯麗，商業貿易活動興盛，吸引群英聚集，發展成為經濟和文化兼具的區域特色。²⁶

故筆者認為，相較於梁宋，齊魯雖交通略顯不完善，但唐代許多詩人從兩京至梁宋地區，亦會輾轉或直接至齊魯，可見其交通仍然方便行旅者到達，旅程距離也是行人可接受的範圍內。可由此初步推斷，外來詩人們選擇梁宋齊魯主要原因之一，是因梁宋齊魯地域以交通上來說，是一個便利的選擇。在唐代漫遊風行下，許多人員必當會經過此條路線，而在此地的隱居者，便能在行人往返間獲得仕宦消息，以待最佳時機。且此便利的要道，可以讓詩人們即使在行旅中，依然臨京畿外圍之地，方便在短時間內進入到兩京。此外，梁宋齊魯的生活環境與經濟發展，都能使行旅者無所匱乏，毋須擔憂現實層面上的供需問題，即便將路線從兩京延展至梁宋齊魯，也能有所因應，於異地得到適時補給。

「兩京驛道至梁宋齊魯」因為地緣之因，交通便利，生活環境佳，成為盛唐詩人選擇頻繁往來返去的路線，這些詩人之所以會活絡於此條道路，最終目的不外乎將其視為仕進之路。筆者依據盛唐五位詩人為例，以詩人行蹤與詩作來分析驗證，詩人是以何種仕進模式，選擇此條路線。以下細分為「停歇客寓」、「暫緩入彀」、「營求生計」三種仕進模式論之。

²⁵ 詹鍔：《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頁4284-4288。文中李白詩文皆出此書，為避繁瑣，不再一一註記。

²⁶ 關於唐代梁宋齊魯的詳細發展概況，如政治、經濟、社會、地理等，因於拙著碩論已有相當篇幅討論，故於此不再多做筆墨重述。參見註2，第二章。

三、「停歇客寓」的仕進模式：李白、高適

「客寓」一詞首先由日學者松浦友久提出，所謂客寓，乃旅居於外之人，並無固定的久留之地，每到一處只是暫且停留，而非久居。某個個人作為連續不斷「行旅之人」，也就是「客寓者」，連續不斷作為各地的臨時住民的客寓者。²⁷杜詩「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頁294），因李白長期遊寓於齊魯，因有「山東李白」之美名。後甚有李白是山東人之說法，雖此說已遭諸位學者推翻，²⁸但也證明了齊魯宛如李白第二個故鄉。高適大半輩子寓居梁宋、漫遊齊魯，對於高適一生來說，是一段漫長的歷程，消磨掉了他生命近二分之一的時間。²⁹可見，兩京驛道至梁宋齊魯此段路線，之於兩人有無比深刻的生命向度，於下詳述之。

（一）李白（701-762）³⁰

李白是從長安至東魯，後又從東魯入京，³¹還山後在梁宋齊魯二地往返。³²李

²⁷ 參松浦友久著，劉維治等譯：《李白的客寓意識及其詩思——李白評傳》（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286-287。

²⁸ 關於「山東李白」的考證，詳參陳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問〉，陳友琴：〈與俞平伯先生商榷山東李白的問題〉，夏敬觀等著：《李太白研究》（臺北：里仁書局，1985年），頁127，頁399-407、葛景春：〈略考「山東李白」之由來〉，《李白研究管窺》（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20。

²⁹ 左雲霖：《高適傳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頁24。

³⁰ 筆者於此聚焦討論的期間為：開元二十八年（740）李白東遊齊魯，後移居東魯，寓居兗州任城。天寶元年（742）秋，因玉真公主薦，自東魯入京，遂待詔翰林。天寶三載（744）春，上書求還山，洛陽遇杜甫，後李白、高適、杜甫同遊梁宋。天寶四載（745）春夏間，至齊州。秋，李白、杜甫同在兗州，往返東魯與兗州。參見註25、註5、（日）笈久美子著，王輝斌譯：〈李白年譜〉，《寶雞文理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期第18卷（1998年6月），頁19-28、施逢雨：《李白生平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年）及呂華明、程安庸、劉金平：《李太白年譜補證》（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整理，此段期間行蹤大抵已為學術界公認。

³¹ 丁冲考證李白一生中四次入東魯，前後長達十六年之久。參丁冲：〈李白四入東魯始末〉，

白一生中極為重要的待詔翰林一事，前後緊扣著兩京與梁宋齊魯地域。他初至東魯時曾作〈客中作〉：「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頁 3099）不論是在長安還是魯地，李白都是客子身分，但不同的是此地讓李白忘卻自己是異鄉人，不論是美酒還是東道主的盛情，都讓李白暫時遺忘長安求仕不順之事。³²為何他最終選擇離開長安移居東魯？李白此次入長安，據諸家所考雖曾與崔宗之、玉真公主、張垍兄弟等人交遊，積極的建立人脈，處處尋求薦引，但其效果未彰，甚而遭受冷遇。換言之，此結果並不能讓一心想盡快找到進身之途、展現宏大抱負的李白滿意。故長安與終南山似乎並不符合李白當初的期待，因此轉而至齊魯之地。

從終南山到齊魯，〈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

韓生信英彥，裴子含清真。孔侯復秀出，俱與雲霞親。峻節凌遠松，同衾臥盤石。斧冰漱寒泉，三子同二屐。（節，頁 2312）

時白與韓準、裴政、孔巢父等人隱居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徂徠山與終南山的隱居，筆者認為最大的差異，是徂徠山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友人，與李白一同隱於山

《李白研究論叢（第二輯）》（四川：巴蜀書社，1990年），頁 237-242。

③② 李白在寓居東魯之前，諸家目前多持曾至長安之說，只不過時間說法不一。目前學界有一次、二次、三次入京說觀點，贊成李白二入長安的說法較多，也就是除了天寶元年（742）奉召入長安外，在此之前亦曾入長安，參杜曉勤：《隋唐五代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頁 775-778。據施逢雨所考，李白在開元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737-740）初入長安，在開元二十八年（740）離開長安前往山東地區。參施逢雨：《李白生平新探》，頁 83-102。學界對李白第一次入長安的時間今仍存分歧，筆者擇參最新出版的施逢雨之說，其對於各種異說皆有考證和辨析。

③③ 關於李白初入長安的原因與目的，隱居終南山原委，目前已有學者有所考辨。如薛天緯：〈李白一入長安事迹之我見〉，《唐代文學論叢》總第 3 期（1983 年），頁 275-285、郁賢皓：《天上謫仙人的秘密——李白考論集》（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頁 31-46；頁 169-212、陶新民：〈李白一入長安試論〉，《河北大學學報》第 2 期（1993 年），頁 9-14、施逢雨：《李白生平新探》，頁 83-96 等。

中，足見與友人的遊興之樂，是功名利祿也無法替代。李白本是好客愛友之人，〈魯郡堯祠送張十四遊河北〉甚言：「歸來泰山上，當與爾爲鄰」（頁 2370），希冀友人能速從他地回齊魯，與他一同爲鄰。李白從長安至齊魯迄離開，不過短短兩年，但卻全然不見他對於初到地的生澀和格格不入，反倒是與人之間的相處，讓他忘記在長安遭受的冷遇。³⁴不同於在長安，李白建立的人情網路，總是多了一層求仕進的目的性，而在此地相遇的多半是士人，少了政治性的意圖，反倒讓李白更爲自在，更符合他自身的個性。

李白由東魯應詔入京，葛景春認爲主因是其隱居於徂徠山，以隱逸和詩才名震京師，更以「山東李白」聞名海內。³⁵李白不同於唐代士子們奔波於科舉仕途，故隱逸入仕便是他另一條路。李白初入長安時，曾隱居於終南山，諸家對於他隱居終南山是否欲仿「終南捷徑」說法有異，但不論何因結果並不稱意。從〈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時時或乘興，往往雲無心。出山揖牧伯，長嘯輕衣簪。」（頁 2312）可知隱逸之人似非真心隱逸，反倒對出仕之途有所期待，說是無心，乃因此刻不逢機運，僅能自我解讀暫讓和看輕權貴與官職。至於李白爲甚麼選擇徂徠山隱居？其因詩作大多散佚，無法有確切答案。³⁶從李白回憶齊魯之詩〈古風·昔我遊齊都〉（頁 109），可知其對齊魯的記憶，大多不離仙事。又〈遊泰山

³⁴ 李白並非初到魯地，即滿意齊魯的一切，〈嘲魯儒〉（頁 3609）、〈五月東魯行答汶上翁〉（頁 2614）詩皆表現出李白對於魯文化的排斥，參邱躍坤：〈李白與魯郡人的衝突〉，《濟南師專學報》第 1 期（1995 年），頁 56-60、戴偉華：《地域文化與唐代詩歌》（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125-130 及李楠、陳元鋒：〈李白與齊文化〉，《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1 期第 51 卷（2006 年），頁 101-105 等研究成果。筆者於此並非強調文化關係，故不多作論述。

³⁵ 參葛景春、劉崇德：〈李白由東魯入京考〉，傅璇琮、羅聯添主編：《唐代文學研究論著集成》（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年），頁 98-101、葛景春：〈略考「山東李白」之由來〉，頁 20。

³⁶ 劉傳錄有一〈「詩仙」李白隱居徂徠山真實原因〉之報導，《大眾日報》，2011 年 11 月 15 日。觀其內容作者以爲李白隱居徂徠山是爲仿效王希夷隱居徂徠山而獲帝眷，以及唐代封禪泰山有關。據筆者所查李白有關齊魯之詩作，並未有提及有關王希夷典故，或因相關詩作散佚，故對此說存保留態度。

六首》（頁 2791-2805）多將泰山描繪成神祕的蓬萊仙境，正符合李白求仙問道的太虛幻境。³⁷ 換言之，齊魯既符合李白「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頁 1999）的志願，又可與志同道合的友人一同隱居，此地何嘗不是最佳選擇？故筆者可以推論，不論李白是否爲了仿效王希夷，又或者期待玄宗封禪時受到帝王徵召，皆顯露李白此時寓居東魯或隱居徂徠山，是一種以隱待仕的方式，對於此地寄予一層政治情愫。³⁸ 此地可以讓他跳脫兩京中的官場權貴糾葛，更符合他狂放灑脫的性格，但卻不與他積極入世的準備有所衝突。

還山後的李白，又爲何選擇漫遊梁宋齊魯？葛曉音認爲李白是因遭讒受謗而被迫還山，並非認清玄宗無意重用自己，主動告退還山。³⁹ 不論何因，李白當時憑藉隱逸入魏闕，但今又回到了原點。離開長安後，李白選擇在梁宋一帶活動，主因是積極入世的李白對於重返長安仍有無限的寄望。正如葛曉音所言，在梁宋李白可以結交豪貴名士，隨時打聽朝廷動向和政治形勢，消息靈通，便於活動。⁴⁰ 〈書情贈蔡舍人雄〉：

舟浮瀟湘月，山倒洞庭波。投汨笑古人，臨濠得天和。閑時田畝中，搔背
牧雞鵝。別離解相訪，應在武陵多。（節，頁 1466）

李白詩中雖自言欲歸田畝，不問世事，但他更是期盼友人，甚至是明主親至桃源地拜訪，而此刻容身的隱居地正是梁宋。可以想見，李白重蹈以隱待仕的模式，再待重歸朝廷的機會。除了梁宋，李白去朝後亦在齊魯來去。李白初入長安不遇，曾隱居於徂徠山，今又舊事重演，故〈酬張卿夜宿南陵見贈〉：「一朝攀龍去，

³⁷ 參見註 2，頁 189、143-145 有詳盡說明。

³⁸ 陳貽焮：〈唐代某些知識分子隱逸求仙的目的——兼論李白的政治理想和從政途徑〉一文對於李白隱逸求仙等從政方式有精闢論析，《李白研究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頁 385-406。

³⁹ 葛曉音：〈李白一朝去京國以後〉，《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年），頁 386-390。

⁴⁰ 同前註，頁 392。

龜黿安在哉？故山定有酒，與爾傾金罍。」（頁 2382）重歸故山，才是李白的選擇。又〈聞丹丘子於城北山營石門幽居中有高鳳遺跡僕離羣遠懷亦有棲遁之志因敘舊以寄之〉：

方從桂樹隱，不羨桃花源。高風起遐曠，幽人跡復存。松風清瑤瑟，溪月湛芳樽。安居偶佳賞，丹心期此論。（節，頁 1927）

李白於東魯聽聞元丹丘石門幽居事，舊時兩京的都會盛況，今已變成「陌上何喧喧，都令心意煩」（頁 1925），只是更加的篤定了李白安居於此的決心。李白去朝還山後，不僅選擇了位居要津的梁宋，以及他熟悉不過的故地齊魯作為以隱待仕之處，雖言其漫遊，但實為懷志而隱，寓居靜待良機。

（二）高適（706？-765）⁴¹

高適客居梁宋近三十年，而其中未及兩年的時間還曾遊齊魯，這段時間占去了他生命近二分之一的時間。歸宋州前，曾短暫停留在洛陽。〈別韋參軍〉一詩看到他初歸宋州的心情轉折：

⁴¹ 本文高適蹤跡皆參（唐）高適撰，劉開揚箋註：《高適詩集編年箋註》（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周勛初：《高適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唐）高適撰，阮廷瑜校注：《高常侍詩校注》（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0年）、彭蘭：〈高適繫年考證〉，《文史》第3輯（1963年），頁287-314、孫欽善：〈高適年譜〉，《北京大學學報》第6期（1963年），頁57-66、王達津：〈詩人高適生平繫詩〉，《文學遺產增刊》第8輯（1961年11月），頁221-230、孫欽善：〈高適年譜諸疑考辨〉，《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第4期（1983年），頁61-69、郁賢皓：〈高適研究的可喜成果——評《高適年譜》〉，《文學評論》第5期（1984年），頁133-138、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高適年譜中的幾個問題》（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統整。其中諸家對於高適的生年，說法不盡相同，故行跡年份有所落差，但其前後蹤跡差異不大。又彭蘭認為高適解封丘尉，回長安後，曾東返宋城。又王達津以為開元二十三年（735）高適到長安，旋赴封丘尉任。去封丘尉職後才與李杜有梁宋之遊、往齊州。此二說皆於傅璇琮一文中遭到推翻。關於這段行蹤幾個時間點，如開元二十三年（735）赴長安、開元二十年（732）遊薊州、天寶八載（749）登第授封丘尉等，傳文已將諸譜一一作詳考。

二十解書劍，西遊長安城，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國風沖融邁三五，
朝廷歡樂彌寰宇，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歸來洛陽無負郭，
東過梁宋非吾土。^{④2}（節）

從初入長安的豪情壯志，直到言洛陽非立足之地，只能客寓梁宋。^{④3}寓居梁宋的期間，足跡遍及河北、河南及湖北、湖南一帶。約開元十八年（730）前後北遊燕趙，且於燕地從軍。往來東北邊陲，求援引，無結果。後脫離軍隊，轉思赴長安謀思路，再南返宋州。客居梁宋、漫遊齊魯的期間，^{④4}曾從宋州二入長安，且即便期間有短暫的旅行，最終都會回到宋州。而高適為何會選擇宋州作為他的寓居處？從王彥明《高適宋中三十年研究》所言原因之一的地理因素，因宋州水路交通發達，促進了各地人員的往來，保證了信息來源的廣泛性和豐富性，從中取得入仕的機會。^{④5}高適在宋中的生活和詩歌，多有學者有全面性的研究，筆者擬從隱與仕

④2 （唐）高適撰，劉開揚箋註：《高適詩集編年箋註》（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0。文中高適詩皆出此書，為避繁瑣，不再一一註記。

④3 高適在梁宋齊魯的期間，除了停歇寓居於此，也不斷地在尋求干謁。高適初遊長安是在開元七年（719），但不遇，復歸宋州。歸宋州前，曾短暫停留在洛陽。回到宋州的高適，仍未放棄追求仕進的機會。初回宋州，往來東北邊陲求援引無結果。從當時的詩作來看，高適極為盡力的在經營政治人脈圈，如〈鉅鹿贈李少府〉（頁18）、〈真定即事奉贈韋使君二十八韻〉（頁19）、〈酬司空璩〉（頁24）、〈酬李少府〉（頁27）、〈別馮判官〉（頁31）等多首與官員的交往詩作，可惜仍未受到賞識。開元二十三年（735）再自宋州赴長安應試，仍不第，歸宋州。高適在宋州仍多與當地的官員交往，想再次尋求認同，等待機遇。如〈同房侍御山園新亭與邢判官同遊〉（頁62）、〈宋中別司空叔各賦一物得商丘〉（頁78）、〈同羣公十月宴李太守宅〉（頁107）、〈畫馬篇同諸公宴睢陽李太守各賦一物〉（頁108）、〈奉酬睢陽李太守〉（頁109）等詩。天寶八載（749）赴長安，應試中第，授封丘縣尉（今河南新鄉）。故之於高適而言，此條路線不僅是停歇客寓之路，亦是一條尋求干謁之路。不過對於高適最能籠括其地域活動的仕進主線仍以停歇客寓為主，因此筆者將其歸為此類。參見註41。

④4 天寶三載（744）與李白、杜甫漫遊梁宋，不久即離宋赴楚。後自睢陽，赴兗州魯郡（今山東曲阜）、鄆州東平（今山東東平）、齊州濟南（今山東濟南）。天寶五年（746）秋始有河南之遊，天寶六載（747）夏秋間自衛州（今河南）渡黃河歸至梁宋。參見註41。

④5 王彥明：《高適宋中三十年研究》（陝西：西藏民族學院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8年6月），頁12-15。

的角度切入討論。⁴⁶葛立方謂高適「意在退處者，雖饑寒而不辭；意在進爲者，雖賫貪而不顧：皆一曲之士也。」⁴⁷對於隱和仕的選擇，高適似乎是視現實情況抱持著可仕則仕，可隱則隱的態度，因此他並非完全採取被動的心態，雖隱居江海，但仍心馳魏闕，否則他不會如此積極的尋求汲引，建立人際網路，甚至二入長安。高適隱居梁宋時效法陶淵明「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歸園田居〉其三）的精神，⁴⁸漁樵耕牧的農圃瑣事樣樣親作。無奈梁宋「兔苑爲農歲不登，雁池垂釣心長苦」（〈別韋參軍〉，頁10）、「莫以山田薄，今春又不耕」（〈別從甥萬盈〉，頁79），當地的耕作條件並不佳，農收欠豐，農耕之事顯得格外辛苦。因此當初「託身從畎畝，浪跡初自得，雨澤感天時，耕耘忘帝力。」（〈酬龐十兵曹〉，頁13）的豪情壯志，也被漁樵農耕之事消磨殆盡。因此便言：「君將挹高論，定是問樵漁。今日逢明聖，吾爲陶隱居。」（〈送虞城劉明府謁魏郡苗太守〉，頁120）語氣中帶有憤恨不平之氣，若是今日適逢明主當朝，自己即便隱居於此，還是可以獲得帝王賞識。換言之，高適一直在此地等待仕進的機會，只是時機未到，他爲了生計也只能選擇繼續躬耕隴畝。故〈途中酬李少府贈別之作〉云：

余亦愜所從，漁樵十二年，種瓜漆園裏，鑿井盧門邊，去去勿重陳，生涯難勉旃。（節，頁83）

不論是在梁宋，或期間漫遊至齊魯，在等待的歲月中，高適的心情起伏定在極端正負面遊走數次。是要「弱冠負高節，十年思自強，終當不得意，去去任行藏。」（〈魯郡途中遇徐十八錄事時此君學王書嗟別〉，頁140）不得意的繼續隱居，還

⁴⁶ 如王增斌：〈高適在宋州的詩歌創作〉，《滄州師範專科學院學報》第4期第19卷（2003年12月），頁26-27、同前註。

⁴⁷ （宋）葛立方：《韻語春秋》，（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11，頁571。

⁴⁸ （東晉）陶潛著，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42。

是要像安慰友人般自勉，「耿介挹三事，羈離從一官，知君不得意，他日會鵬搏。」（〈東平留贈狄司馬〉，頁 149）期盼自己有朝一日也能高居要職。實際上，高適在隱與仕間，早就做好了決定，只不過在長達近三十年的歲月中，內心是需要有所寄託，故僅能視現實狀況而不斷地變動。

四、「暫緩入彀」的仕進模式：杜甫、岑參

廖師美玉曾於〈漫遊與漂泊——杜甫行旅詩的兩種類型〉一文中以「以漫遊緩解入彀的拘限」標題，論述杜甫壯年的漫遊，是以此延緩過早「入彀」的政治拘限和名疆利鎖。⁴⁹岑參與杜甫不同，蹉跎了十年，才決定暫時逸離往返十年的兩京。兩京至梁宋齊魯此條路線，正是杜甫與岑參足以適時逃脫和短暫緩解的地域，以下詳述之。

（一）杜甫（712-770）

杜甫的生年與蹤跡，目前學界研究成果明朗一致。杜甫自開元十三年（725）至開元十八年（730）便在東都，出遊於翰墨之場。開元十八年（730）始遊晉（今山西），未久，回東都。開元十九年（731）始遊吳越（今江蘇、浙江一帶），迄開元二十三年（735）歸東都，舉進士，不第。開元二十四年（736）至開元二十七年（739），始遊齊趙（今山東與河北南部一帶）。開元二十八年（740）在縱遊齊趙中，至兗州省親。⁵⁰開元二十九年（741）由齊魯歸洛陽，直天寶三年（744）出遊梁宋，⁵¹天寶四年（745）再遊齊魯。天寶五年（746）從魯郡歸洛

⁴⁹ 廖師美玉：〈漫遊與漂泊——杜甫行旅詩的兩種類型〉，《臺大中文學報》第 33 期（2010 年 12 月），頁 229-235。

⁵⁰ 喬長阜認為杜甫應是在開元二十四年（736）應進士試，而壯遊的時間可能始於開元二十七年（738），次年結束。此為與諸家相異之處，見喬長阜：〈杜甫的應進士試和壯游齊趙新探——兼探杜甫初游吳越的時間〉，《杜甫研究學刊》第 4 期（1997 年），頁 34-38。

⁵¹ 關於李白、杜甫、高適同遊梁宋的考辨，諸家多有考辨。參見註 2，頁 84-86，有進一步討論。另增補楊承祖：〈杜甫李白高適梁宋同遊考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學術論文集》（臺

陽，隨即至長安。天寶六年（747）在長安應試，遭李林甫之忌而退。此後，杜甫開始了十年旅食京華的日子。⁵²杜甫在長安十年的日子前，曾漫遊吳越、梁宋及兩次至齊魯。

杜甫開元二十四年（736）落第後遊洛陽時作〈遊龍門奉先寺〉：「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頁1），清晨寺中的鐘聲，宛如是點醒他內心決定的媒介，頓時有所警悟。而這是怎樣的頓悟呢？杜甫選擇了暫時拋開落第的塵氛，遠赴淨土，因此開始吳越之遊，也是杜甫第一次長時間離開東都。〈壯遊〉：

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驚鷗。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強。（節，頁1441）

第一次的落第，未值而立之年的杜甫不見失志，反倒是帶著放蕩漫遊的心情離開東都。杜甫結束了齊趙之遊，再次返回洛陽遊龍門作〈龍門〉詩：「往來時屢改，川陸日悠哉。相閱征途上，生涯盡幾回。」（頁29）離開洛陽幾年，再次回到舊地，萬事已有變化，似乎已不再是那個他既定印象中的地方。尾聯也預告著自己會再次離開洛陽，表露出對洛陽的情感，是想留卻不能留的心情。因此，他再次離開東都。而第二次離開東都，旅行梁宋齊魯的原因，〈贈李白〉：

北：水牛出版社，1985年），頁1241-1253，認為同遊考年仍未確、喬長阜：〈杜甫與高適李白游宋中考辨——兼辨杜李游魯及杜入長安時間〉，《鎮江高專學報（綜合版）》（1994年12月），頁26-28，認為是在天寶四年（745）、陶瑞芝：〈杜甫和高適、李白同游宋中在何時——兼與喬長阜同志商榷〉，《杜甫研究學刊》第1期（1996年），頁65-70，則是反駁了喬文，認為是在天寶三年（744）。故筆者於此以諸家多認為的天寶三年（744）言之。

⁵² 參學海出版社編輯部編：《杜甫年譜》（臺北：學海出版社，1981年）、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1年）、陳貽焮：〈杜甫壯游蹤迹初探〉，傅璇琮、羅聯添主編：《唐代文學研究論著集成》，頁159-164、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十次冊，少陵新譜》（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蔡志超：《杜詩系年考論》（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整理。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膾脍，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頁 32）

杜甫從齊趙壯遊回到洛陽，心境上有明顯轉變，反倒不適應當初出遊的翰墨之場，不習慣大都市的燈紅酒綠，甚至認為是爾虞我詐的生活。此時開始有了嚮往隱居山林的念頭，而梁宋正是他心中最佳的擇處，這也是對洛陽想留卻還是離開的原因。

當杜甫離開東都，又是抱持著什麼樣的心情呢？從杜甫與梁宋齊魯有關的詩作中，感懷傷己不遇的心情寫照，少之又少，思鄉念國之情亦不多見，多半呈現正面的愉悅情緒。⁵³當然，因為此時的他才正值青壯年時期，仍懷抱慷慨激昂的心志。他認為這兩次的離開，僅是一種表面的有形距離，內心的真性情並未因地域的移動而改變。杜甫第一次出東都，即便是落第，仍對官途充滿信心，豪邁壯遊後又再返回。但回到洛陽兩年，心境上卻開始起了變化，開始厭倦了這些世俗紛擾，欲歸隱山林，又開始梁宋齊魯之遊。最終，杜甫還是從齊魯回洛陽赴長安應試，⁵⁴自言「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壯遊〉，頁 1442），這近八九年來的漫遊地，皆非他的終點站，不論是梁宋還是齊魯都僅是他待展長才的過渡地帶。⁵⁵可見杜甫把梁宋齊魯當作他的避世之地，因為此地就如同終南山般，是一個可

⁵³ 據筆者所查僅〈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晨朝降白露，遙憶舊青氈。」（頁 14）因悲秋而動思鄉之情、〈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頁 26）、〈贈李白〉：「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頁 42）、〈冬日有懷李白〉：「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頁 50）三首言己仍失意漂泊，其餘詩作多表凌雲之態。

⁵⁴ 喬長阜於〈杜甫再游齊魯和西歸長安考辨〉一文中考證杜甫是因天寶六年（747）玄宗下詔，應召者必須從各地趕赴長安，《杜甫研究學刊》第 1 期（1996 年），頁 64。另於〈杜甫二入長安時期的幾個問題——兼辨杜甫應進士中的兩個問題〉中探討到杜甫二次赴長安，從舉進士改為應徵詔的方式之因作考辨，《杜甫研究學刊》第 3 期（1996 年），頁 71。

⁵⁵ 拙著：〈李杜齊魯詩作比較研究〉，《東吳線上學術論文》第 12 期（2012 年 12 月），頁 25-44，以杜甫在齊魯的詩作有進一步的說明。

進可退的空間，如果鍾情於官途與利祿，則進入城中，融入京城社會，最後進入官場。如果厭倦了塵世，又可以悄然的隱於終南山中以顯氣節。⁵⁶

此外，對於杜甫來說，梁宋齊魯亦是一個充滿宗教色彩的地方，許多到此地的文人多與當地的僧侶、道士有所交往，他也不例外。〈昔遊〉：

昔謁華蓋君，深求洞宮腳。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艮岑頂，巾几猶未卻。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遊名山，發軔在遠壑。良覲違夙願，含淒向寥廓。林昏罷幽磬，竟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饗虛馭，歸徑行已昨。豈辭青鞋胝，悵望金匕藥。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伏事董先生，於今獨蕭索。（節，頁 1795）

詩中記載杜甫先至梁宋訪華蓋君，但因其已逝，後又轉至齊魯訪董鍊師。此先後的訪道之行，在杜甫晚年還記憶猶新，甚為遺憾，可以見得他對此事的虔誠態度。梁宋齊魯對於杜甫來說，可以是一個入世的都會區，也是一個可以超俗的隱居地，具備著雙重的特性，此城市的功能正如同長安與終南山間可進可退的微妙關係。

為什麼杜甫會選擇梁宋齊魯當作他的休憩站呢？杜甫在夔州（今四川）回憶梁宋言：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遣懷〉，節，頁 1447）

杜甫對於梁宋之地的都會盛況，交通發達多表讚嘆，當地的人物風俗的俠義之氣更讓其佩服。或許對於杜甫來說，都會的盛況不遜於京都，也少了京邑中官僚的醜態，社會風氣讓他更為自在。

⁵⁶ 同註 3，頁 159。

我們可以說，杜甫適時的選擇暫退政治的中心，且梁宋齊魯都是距離兩京不遠之地，對於一個始終胸懷壯志，卻想暫時逍遙而去的不遇者，這何嘗不是一個最佳的選擇？不僅找到一個符合精神解脫的地域，也毋須讓自己完全與兩京脫節，以不斷逸離拉開個人與京城的黏著度，藉由漫遊而拉大視域，使自己避免陷溺在京城定式的窠臼中。⁵⁷

（二）岑參（715-770）

岑參生年亦有多種說法，據諸家考證結果，其約在二十歲至三十歲左右便常出入長安、洛陽間。開元二十九年（741）從長安游河朔，途經邯鄲（今河北邯鄲）、鄴城（今河北臨漳縣西），歷井陘（今河北井陘縣），抵貝丘（今山東清平縣西），暮春抵冀州（今河北冀縣）、秋至滑州匡城（今河南長垣縣西南），經鐵丘（今河南滑縣東北），旋至汴州。春日歸至長安。天寶三載（744）在長安及進士第。⁵⁸

⁵⁷ 同註 49，頁 234。

⁵⁸ 參（唐）岑參著，劉開揚箋註：《岑參詩集編年箋註》（四川：巴蜀書社，1995 年）、賴義輝：〈岑參年譜〉，《嶺南學報》第 2 期第 1 卷（1929 年 5 月），頁 107-143、朱自清等編：《聞一多全集（三）·岑嘉州繫年考證》（臺北：里仁書局，2000 年），頁 101-142、傅璇琮等著：《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廖立：〈岑參出游考〉，《中州學刊》第 2 期（1997 年），頁 92-96、（唐）岑參著，陳鐵民、侯忠義校注：《岑參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李嘉言：〈岑詩繫年〉，《文學遺產增刊》第三輯（1956 年），頁 119-154 統整。其中聞一多認為〈至大梁卻寄匡城主人〉之大梁並非汴州而是滑州，此說與諸家異。又，賴義輝將此詩編年在天寶五載（746），認為是在登進士第之後，此說法與諸家異。諸家在論及岑參這段蹤跡時，多以〈送郭義雜言〉詩考之：「何時過東洛，早晚渡盟津，朝歌城邊柳隄地，邯鄲道上花撲人。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曾上君家縣北樓，樓上分明見恆嶽。……到家速覓長安使，待汝書封我自開。」（節）見（唐）岑參著，劉開揚箋註：《岑參詩集編年箋註》，頁 59。又〈感舊賦〉一文言：「我從東山，獻書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嗟世路之其阻，恐歲月之不留，睽城闕以懷歸，將欲返雲林之舊遊。」（節，頁 829）案岑參大約二十歲（及開元二十至二十五年左右）上書闕下，屢次往返長安、洛陽間，共十年，即已三十歲。因諸家對於岑參的生年不一，因此亦有將此十年算至登第前。獻書無果，便開始北游，筆者重點討論岑參這次北游。

據諸家所考，岑參約在開元二十九年（741）春夏間出關，而至次年天寶元年（742）的春日歸長安，約一年左右的時間，而此次北游最終目的為汴州。再從「下馬登鄴城」（〈登古鄴城〉）⁵⁹與「驅馬邯鄲道」（〈邯鄲客舍歌〉，頁42）詩中，可以知道岑參的交通工具是馬車，因此此行可以視為岑參的一趟短途旅行。據劉開揚考證〈至大梁卻寄匡城主人〉一詩，滑州南至汴州二百一十里，馬行均一日可到（頁51）。若以長安正東至汴州1280里，約馬行均六至七日便可到達，往返最多十二、三日便可回到長安。即便他還曾繞至河北道博州（貝丘），還是無須花至一年的時間。可見岑參是沿路遊覽、駐停，使這趟旅程約一年才完成。

而這趟旅程，開始於岑參獻書無果，從他的詩作中，也看出了他心境上的變化。當岑參離開了往返十年的兩京，要踏出旅程的首步，遠離京都，其實對他來說並非簡單的事。〈冀州客舍酒酣貽王綺寄題南樓〉云：

客舍梨花繁，深花隱鳴鳩，南鄰新酒熟，有女彈箏篴。醉後或狂歌，酒醒滿離憂，主人不相識，此地難淹留。吾廬終南下，堪與王孫遊，何當肯相尋，澧上一孤舟。（節，頁44）

即便客舍冀州與故人同游，美酒佳樂伴隨兩人，但酒酣耳熱後的清醒，卻讓岑參更明白自己的心思。終言，自己還是會回到長安的終南山下，期盼兩人能在長安再次相聚。以此表明了，此段旅程只是個暫時的逃離，終究還是放不下內心的帝鄉。故又言「唯求縮卻地，鄉路莫教賒」（〈題井陘雙溪李道士所居〉，頁47）恨不得自己能縮短此段路程，即刻移地故鄉。又〈醉題匡城周少府廳壁〉：「婦姑城南風雨秋，婦姑城中人獨愁。愁雲遮卻望鄉處，數日不上西南樓。」（頁48）只能遠望卻仍望不著，只好選擇乾脆不望的逃避心態，表露出岑參的思鄉之情。此行出長安，或許因為十年來的仕途乖舛，迫使他不得不選擇暫時離開京都，透過旅行的空間來轉換心情。即便至此離長安並不遠，但實際上遙遠的是他心中與

⁵⁹ （唐）岑參著，劉開揚箋註：《岑參詩集編年箋註》，頁40。文中岑參詩皆出此書，為避繁瑣，不再一一註記。

魏闕的距離。

如果岑參如此地想回到京城，但為何這趟旅行卻離開了一年才回到長安？既然是懷抱著生不逢時的情緒離開，歸隱之心當會若隱若現。〈至大梁卻寄匡城主人〉：

一從棄魚釣，十載干明王，無由謁天階，卻欲歸滄浪。仲秋至東郡，遂見天雨霜，昨日夢故山，蕙草色已黃。（節，頁 50）

當岑參來到了這趟旅程的終站時，仍舊想起了十年來的獻書未成，歸隱之心油然而生。但實言歸隱，卻是希望以隱待仕，故仍在異地夢見此時的故鄉長安，心中仍期待回到龍門所在。當他回到長安時，此刻的心情又因為身處帝畿，有所差異。

「功名須及早，歲月莫虛擲」（〈送郭義雜言〉，頁 59），可以看見他勉勵郭義應對仕途採取積極態度。又〈送許子擢第歸江寧拜親因寄王大昌齡〉詩中大肆稱讚天寶祥瑞：

玄元告靈符，丹洞獲其銘。皇帝受玉冊，群臣羅天庭。喜氣薄太陽，祥光徹宵冥。奔走朝萬國，崩騰集百靈。（節，頁 62）

岑參對於天寶元年陳王府參軍田同秀，稱於京城永昌街宮中見到了玄元皇帝，以「天下太平，聖壽無疆」之言傳於玄宗，又田同秀言桃林縣故關令尹喜宅旁有靈寶符，玄宗派人尋後，果真又找到了靈寶符此事大力的論讚。⁶⁰此事大多為虛構造假之事，但岑參認知為天寶盛世之象，可想而知他認為此刻的君王是明主，國家

⁶⁰ 《舊唐書·玄宗記》：「至天寶元年正月癸丑，陳王府參軍田同秀稱於京永昌街空中見玄元皇帝，以『天下太平，聖壽無疆』之言傳於玄宗，仍云桃林縣故關令尹喜宅傍有靈寶符。發使求之，十七日，獻於含元殿。於是置玄元廟於太寧坊，東都於積善坊舊邸。二月丁亥，御含元殿，加尊號為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9，頁 926。

甚為昌盛，政治蓬勃發展，故連無稽之談都一併褒揚，再次顯現他對於進仕的渴望和企圖，更期待明主識英才。天寶元年（742）從汴州回到長安後，天寶三載（744）岑參便進士及第。可以得知此次旅程岑參不再選擇隱居於終南山下，而是離開了京畿要地的圓心，但他也沒有偏離圓心的半徑，仍在此半徑內徘徊，適時的拉開與帝京的距離。正如作於天寶二年（743）的〈感舊賦〉云：「強學以待，知音不無，思達人之惠顧，庶有望於亨衢。」（頁831）此詩正是岑參對自己這十年蹉跎心境的總結。

五、「營求生計」的仕進模式：劉長卿

目前學界對於劉長卿（726?-790）的生平研究不多，其完整年譜僅見於三家。儲仲君認為其於天寶三載（744）此前有梁宋之遊，而天寶四載至十三載（745-754）應進士舉，頻繁來往洛陽、長安間。楊世明則認為天寶二年（743）東遊梁宋，天寶四載（745）往返長安、洛陽，天寶五載（746）在長安，落第，直至十三載（754）都在洛陽。蔣寅亦認為他應當是青年時代至梁宋。此外，較為相異之說是胡可先從最新出土的墓志認為，劉長卿並非是旅遊梁宋，而是在天寶十一載（752）在陳留浚儀縣尉任上。但較胡文晚著的阮廷瑜文，並沒有參考此說，且將劉長卿的梁宋之遊編於上元二年（761）。^{⑥1}對於諸家說法，筆者以為儲說與楊說認為劉長卿是在應盡士舉前有梁宋之遊說法較具可信度。^{⑥2}此文牽涉另一問題，劉長卿是在何年登第？目前諸家說法不一，但大體而言，我們可以確信劉

⑥1 參（唐）劉長卿著，儲仲君箋注：《劉長卿詩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唐）劉長卿著，楊世明校注：《劉長卿集編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蔣寅：《大曆詩人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胡可先：〈劉長卿事迹新證〉，《學術研究》第6期（2008年），頁148-160、阮廷瑜：〈劉長卿年譜〉，《輔仁國文學報》第30期（2010年4月），頁120-160整理。

⑥2 筆者認為胡說雖是最新事證，但並不能完全解釋劉長卿在梁宋的詩作，下文分析詩作時會再做說明。而阮文既為最晚出版之論文，但並未論證前說與其相異處，也未詳證己說，故筆者以為此說可信度較為缺乏。

長卿是在登第前有梁宋之遊，且在梁宋之遊後，往返兩京間數年後才登第。⁶³

而劉長卿為何會來到梁宋，在〈睢陽贈李司倉〉詩中說得非常清楚：

飄飄洛陽客，惆悵梁園秋。只為乏生計，爾來成遠游。一身不家食，萬事從人求。且喜接餘論，足堪資小留。寒城落日後，砧杵令人愁。歸路歲時盡，長河朝夕流。非君深意願，誰復能相憂。⁶⁴（節）

劉長卿祖籍並非洛陽，但因從小居於洛陽，故自稱洛陽人。當他來到了宋州，之於洛陽而言，當為客遊，故稱洛陽客。雖以洛陽人自居，但顯然居大不易，迫使他必須為了一家的生計，赴宋州求助於親友。因此，若按胡可先之說，劉長卿是天寶十一載（752）在陳留浚儀縣尉任上，帶有官職的他，應當不會出現窮困至需要他人接濟的窘境。且劉長卿在宋州，也與陳留諸官多來往密切，如〈惠福寺與陳留諸官茶會得西字〉先言：「到此機事遣，自嫌塵網迷」，認為自己還是被許多功利機巧之事的塵俗牽絆，此處可以推測，他始終沒有忘懷他所要追求的仕宦之事。否則他不會言：「傲吏方見狎，真僧幸相攜。能令歸客意，不復還東溪。」（頁11）胡可先認為此處的「傲吏」是自稱，但筆者以為這是他對於陳留諸官的美稱，因他對於仕宦之事，始終未能放棄，因此與陳留諸官有所交往，對於當地的官員與僧侶，當會對此等表敬重之意。最終才會言，即便至此的旅人想要回到隱居首選地東溪，也會因為這些東道主而選擇留下，而這些旅人，當然也包含了自己。換言之，若是要選擇隱居之地，對於劉長卿來說，宋州是個不錯的選擇。

但劉長卿最終的目的，當不會是隱居，〈別陳留諸官〉詩云：「戀此東道主，

⁶³ 傅璇琮認為是在天寶中登第，具體年限不可考。見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劉長卿事迹考辨》，頁260。楊世明認為是在天寶十四載（755）、儲仲君認為是在至德二載（757）應江東進士舉、阮廷瑜認為是天寶十二載（753）、蔣寅以為是在天寶十一載（752）、胡可先則是認為在天寶七載（748）或八載（749）。參見註61。

⁶⁴ （唐）劉長卿著，儲仲君箋注：《劉長卿詩編年箋注》，頁7。文中劉長卿詩皆出此書，為避繁瑣，不再一一註記。

能令西上遲」，此二句也呼應了上詩所言，即便我會因為此地的東道主停留更多時日，但因「上國邈千里，夷門難再期」，最終我還是要回到京都，而京都和此地相聚千里，相見之日可能不再。正如上文所言，以唐代的交通來說，京都至宋州急行一日一夜便可到達，但在劉長卿的心中，兩地卻是遙不可及。因為對他來說，只有京都才是他的久留之地，也因為如此，他日後的蹤跡的確未再到梁宋。可以想見，此地只是他走投無路的停靠站，當他有了能力之後，還是想回到那個居大不易的京都去。胡可先認為詩中所言「不愧寶刀贈，維懷瓊樹枝」（頁12），是劉長卿罷陳留浚儀縣尉後要赴京師當官之作，此段是他以身許國的志向。筆者以為此處應是劉長卿感謝陳留諸官對他的看重，自言不會辜負諸官對他的期許，因為對他來說，他亦是以赴京任官視為他的最終目標。

劉長卿在梁宋的詩作不多，但從詩作中可以知道他因為生計問題來到宋州，因為仕宦之心回到洛陽，顯而易見，梁宋之地對於劉長卿來說，仍舊是一個危急救難的暫棲良地。而為什麼在如此眾多的城市中，劉長卿選擇到宋州求援？詩中並未明言他向何人求援，或許真的有親友住在宋州。若非親友，二級都市宋州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梁宋是一個商業繁榮的大都會，匯聚眾多的商賈，交通網路的四通八達，使得通貨蓬勃經濟昌盛，也因此社會安定無亂，更是全國賴以維生的大糧倉。對於異地旅者劉長卿而言，或許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機會，解決生計問題，也在此地獲得陳留諸官的肯定和建立人情網路，對於他回到洛陽，無疑是給予了相當大的裨益。回到洛陽後，劉長卿並沒有立即獲得賞識，故在〈溫湯客舍〉中云：

君門獻賦誰相達，客舍無錢輒自安。且喜禮闈秦鏡在，還將妍醜付春官。
（節，頁13）

他還是持續的投獻賦頌以求簡拔者，但無奈無人薦達賞識，但思緒一轉，還是認為禮部試是明辨無私的，相信自己有朝一日還是能登第，劉長卿雖一再的失敗，但仍未放棄進入魏闕之心。

劉長卿的梁宋之遊並非肆無忌憚的漫遊，而是身負營求生計的大任。換言之，

京邑雖是他一心嚮往的長住地，但卻因為經濟因素迫使他往赴宋州，故宋州可以說是他的第二選擇。劉長卿暫時轉往他地選擇一個可以暫棲的城市，待他萬事俱備，不再受炊米之事所擾，也在東遊途中建立人情網路後，再回到洛陽準備應舉。

六、結語：兩京與梁宋齊魯之相互關係

筆者認為這些詩人選擇遊走兩京與梁宋齊魯間，與終南捷徑模式不完全相同。「終南捷徑」一詞傳遞了仕不順則隱，隱爲了仕，幾乎是隱而優則仕。而也因為終南山是隱而仕的最佳地理位置，故隱逸的地區、地點的選擇就顯得相當的重要。⁶⁵雖說二條路線都是選擇離京師較近之地，但遊走兩京與梁宋齊魯間的詩人並非將此條路線視爲入朝求官的捷徑，而是將其作爲由仕「入」隱，由隱「出」仕之處。這些詩人首重的並非「隱」與「待」，而是以「遊」代「隱」與「仕」，所以多次迂迴的出入梁宋齊魯且往返這條路線上，且以不同的模式行走於此。

從地理位置來看，梁宋水道便利，陸路幹道四通八達，具有優勢的地理位置，位於陪都洛陽之東，也因此成爲行旅者行經兩京的常經之地。而梁宋之東北的齊魯，連帶因為梁宋的水陸路便利，也使其交通有一定的便利性。梁宋齊魯之地在往返兩京是很重要的交通樞紐，故來往相當便利，這也使得詩人們得以在短時間內藉由空間的轉換，隨著心境的變化，順應時勢進退兩京之間。也因此伴隨著詩人的遷移，梁宋齊魯之地不再是單單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成爲反映詩人追求政治的地理空間意義。

李白與高適都選擇長時間居住於齊魯、梁宋，不斷地以此爲根據地，往返兩京。對他們而言，此地域就如同第二故鄉，有著對此地的認同、歸屬，是一個可以完全投入生命情感，可以恣意的爲了仕途離去，因為記憶早已刻畫留下。杜甫與岑參選擇了此條路線作爲暫時抽離兩京的退居地，無須強逼自己始終身陷仕途未果的窠臼中，亦可隨時任性地投入魏闕的追求，之於他們，這是一條可攻可守的最佳屏障。劉長卿爲了五斗米來到了梁宋，在二級城市他找到了援助，建立了

⁶⁵ 戴偉華：《地域文化與唐代詩歌》（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98。

返回兩京的人情、金錢網路，在現實生活的迫使之下，他彷彿抓到了救命草，找到了謀生與歸回京邑的方法。

當詩人遷移兩京與梁宋齊魯之地，兩京始終是他們追求的最終地域，而梁宋齊魯之地便成為他們選擇暫以棲身之處，因為此地的歷史背景與文化特色，又政治、經濟、社會、地理等環境，都對詩人們產生不同的意義。他們於此經營人情網路，負笈從師的蓄勢待發，耕樵漁牧的隱居，營求生計，求仙問道，雖稱不上完全的歸隱山林，但不同於兩京身陷權力法制的束縛，塑造出兩種不同的空間意義，以空間意義換取心靈的慰藉。

如同長安與終南山並非是單純的地理位置的意義，筆者以為兩京與梁宋齊魯亦是如此。從詩人的行跡與詩作看來，詩人多以梁宋齊魯之地當作求仕不順的退居之地，漫遊在此條路線上。故我們可以說兩京到梁宋齊魯的這條路線，是盛唐詩人的仕進之路，兩地之間具有現實政治的地理空間意義，亦有抽象心靈的空間意義。從盛唐著名詩人多曾自主性的漫遊在這條路線上，並留下許多相關詩作，更值得我們關注這條新的唐詩之路。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東晉·陶潛著，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里仁書局，1981。

唐·高適撰，劉開揚箋註，《高適詩集編年箋註》，北京：中華書局，2000。

唐·高適撰，阮廷瑜校注，《高常侍詩校注》，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0。

唐·李白著，詹鍔編，《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注，《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唐·岑參著，劉開揚箋註，《岑參詩集編年箋註》，四川：巴蜀書社，1995。

唐·岑參著，陳鐵民、侯忠義校注，《岑參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唐·劉長卿著，儲仲君箋注，《劉長卿詩編年箋註》，北京：中華書局，1996。

唐·劉長卿著，楊世明校注，《劉長卿集編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2001。

二、近人論著

（一）專著

丁冲 1990 〈李白四入東魯始末〉，《李白研究論叢（第二輯）》，四川：巴蜀書社。

王靜 2003 〈終南山與唐代長安社會〉，《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編 1999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十次冊·少陵新譜》，北京：北京圖書館。

左雲霖 1985 《高適傳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史念海 1998 《唐代歷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白壽彝 1987 《中國交通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朱自清等編 2000 《聞一多全集（三）·岑嘉州繫年考證》，臺北：里仁書局。

李德輝 2003 《唐代交通與文學》，湖南：長沙人民出版社。

李德輝 2010 〈唐代五都文學圈略論——以都市、交通和物質文化為中心〉，「唐代文史的新視野：以物質文化為主——紀念杜希德國際研討會」論文。

吳松弟編著，譚其驤主編 2002 《兩唐書地理志匯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呂華明、程安庸、劉金平 2012 《李太白年譜補證》，北京：中華書局。

杜曉勤 2001 《隋唐五代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

周勛初 1980 《高適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松浦友久著，劉維治等譯 2001 《李白的客寓意識及其詩思——李白評傳》，北京：中華書局。

施逢雨 1999 《李白生平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郁賢皓 1997 《天上謫仙人的秘密——李白考論集》，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

份有限公司。

夏敬觀等著 1985 《李太白研究》，臺北：里仁書局。

翁俊雄 1995 《唐代人口與區域經濟》，臺北：新文豐書局。

陳貽焮 1964 〈唐代某些知識分子隱逸求仙的目的——兼論李白的政治理想和從政途徑〉，《李白研究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郭沫若 1971 《李白與杜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傅璇琮等編 1998 《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瀋陽：遼海出版社。

傅璇琮 1980 《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

傅璇琮、羅聯添主編 2004 《唐代文學研究論著集成》，西安：三秦出版社。

楊承祖 1985 〈杜甫李白高適梁宋同遊考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學術論文集》，臺北：水牛出版社。

曾大興 1995 《中國歷代文學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

葛景春 2002 《李白研究管窺》，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

葛曉音 1990 《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蔡志超 2012 《杜詩系年考論》，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蔣寅 1995 《大曆詩人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學海出版社編輯部編 1981 《杜甫年譜》，臺北：學海出版社。

戴偉華 2006 《地域文化與唐代詩歌》，北京：中華書局。

（英）邁克爾（Mike Crang）著，王志弘等譯 2003 《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公司。

嚴耕望 2007 《唐代交通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期刊論文

王達津〈詩人高適生平繫詩〉，《文學遺產增刊》第8輯，1961年11月。

王增斌〈高適在宋州的詩歌創作〉，《滄州師範專科學院學報》第4期第19卷，2003年12月。

李德輝〈唐代兩京驛道——真正的「唐詩之路」〉，《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0卷，2007年1月。

李楠、陳元鋒〈李白與齊文化〉，《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1 期第 51 卷，2006 年。

李嘉言〈岑詩繫年〉，《文學遺產增刊》第三輯，1956 年。

阮廷瑜〈劉長卿年譜〉，《輔仁國文學報》第 30 期，2010 年 4 月。

邱躍坤〈李白與魯郡人的衝突〉，《濟南師專學報》第 1 期，1995 年。

拙著〈李杜齊魯詩作比較研究〉，《東吳線上學術論文》第 12 期，2012 年 12 月。

胡可先〈劉長卿事迹新證〉，《學術研究》第 6 期，2008 年。

郁賢皓〈高適研究的可喜成果——評《高適年譜》〉，《文學評論》第 5 期，1984 年。

孫欽善〈高適年譜〉，《北京大學學報》第 6 期，1963 年。

孫欽善〈高適年譜諸疑考辨〉，《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4 期，1983 年。

陶新民〈李白一入長安試論〉，《河北大學學報》第 2 期，1993 年。

陶瑞芝〈杜甫和高適、李白同游宋中在何時——兼與喬長阜同志商榷〉，《杜甫研究學刊》第 1 期，1996 年。

喬長阜〈杜甫的應進士試和壯游齊趙新探——兼探杜甫初游吳越的時間〉，《杜甫研究學刊》第 4 期，1997 年。

喬長阜〈杜甫與高適李白游宋中考辨——兼辨杜李游魯及杜入長安時間〉，《鎮江高專學報（綜合版）》，1994 年 12 月。

喬長阜〈杜甫再游齊魯和西歸長安考辨〉，《杜甫研究學刊》第 1 期，1996 年。

喬長阜〈杜甫二入長安時期的幾個問題——兼辨杜甫應進士中的兩個問題〉，《杜甫研究學刊》第 3 期，1996 年。

彭蘭〈高適繫年考證〉，《文史》第 3 輯，1963 年。

（日）笥久美子著，王輝斌譯〈李白年譜〉，《寶雞文理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 期第 18 卷，1998 年 6 月。

廖師美玉〈漫遊與漂泊——杜甫行旅詩的兩種類型〉，《臺大中文學報》第 33 期，2010 年 12 月。DOI: 10.6281/NTUCL.2010.33.06

廖立〈岑參出游考〉，《中州學刊》第 2 期，1997 年。

賴義輝〈岑參年譜〉，《嶺南學報》第 2 期第 1 卷，1929 年 5 月。

薛天緯〈李白一入長安事迹之我見〉，《唐代文學論叢》總第 3 期，1983 年。

（三）學位論文

王彥明《高適宋中三十年研究》，西藏民族學院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8年。
拙著《唐詩中的梁宋齊魯——以外來詩人為主軸的地域書寫》，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四）報章

劉傳錄 2011〈「詩仙」李白隱居徂徠山真實原因〉，《大眾日報》2011.11.15。

The Post-Roads between Two Capital to Liang-Song and Qilu: The Writing of the Climax of the Tang Dynasty Poets and Poems

Guo, Li-Jyun

Ph.D. student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ang dynasty, the well-developed post-roads transportation between two Capitals brought a continuous stream of travelers, thus this thoroughfare became a famous “road of Tang poetry”. Extending eastward from two Capitals is Liang (now Henan Kaifeng) and Song (now Henan Shangqiu), this east-west axis made the area of Liang-song turned into a largest provisional capital. Extending to the northeast from Liang-song, is Qi (now Shandong Zibo), Lu (now Shandong Qufu) area. Transportation to Qilu also benefited by virtue of the transportation advantages to Liang-song. The route from two Capitals to Liang-song and Qilu became the choice of high Tang’s poets’ journey because of its ideal geopolitical rela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network. On this route, poets have different active modes of career-making, such as residing as visitors, stopping being employed temporarily or try to make a living, made this area a buffer zone between being official or live in seclusion. With the poets’ movements, the route from

two Capitals to Liang-song and Qilu is also the route to the officialdom. The two Capitals and Liang-song Qilu not only has geospatial meaning of political reality but even more a meaningful space in poets' spiritual level.

Keyword: Two Capitals, Liang-song, Qilu, High Tang, Tang poetry